

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研究三题

戚学民

(清华大学 北京 100084)

摘 要 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学科,“革命”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它的构建和发展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学同样肩负重任,深化它的研究必须具有探索和开放的精神,在方法论的本然层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要具备通史眼光,扩张学科边界,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需要一批具有德、才、学、识兼备的学者积极参与,他们应当思想敏锐,时代感强,了解民族传统,深具探索精神。

关键词 中国特色近现代史;革命;马克思主义;史德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19.04.008

中国史学有悠久和伟大的传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所指出的“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①在近代一百多年的历程中,中国的历史学界承前启后,把中国史学带入了现代世界,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建立了一套依托于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并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研究体系。在进入21世纪新时代的时刻,作为中国史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近现代史学^②具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担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不仅需要继续阐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同时需要从中吸取有关经验,从历史的视角解释中国未来走向等众多重大现实问题。因此,从进一步深化对具有中国特色近

现代史学的研究而言,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本文从本质属性、研究方法和研究主体等三个层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探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其本质属性,以便我们明晰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内核和研究范式等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本质属性存在于其本身的历史中。“中国近现代史”是一个“革命”的学科,是在近代中国革命中逐渐形成的,其学科的地位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确立,并且在中国革命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与中国革命具有血肉联系,很少有学科这样与一个国家有如此直接和密切的联系。中国近

作者简介:戚学民,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团体与民国外交研究(1912-1928)”(项目编号:17BZS065)。

①《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②本文所用的“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的历史,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1840-1919)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的合称。

现代史学科不仅记载了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也参与塑造了现代中国,其学科本身也是这个过程的产物。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历史记载是国家存亡续绝的工具。在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奋斗救国时,历史学是救亡图存的武器。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诞生于“五四”之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从初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一是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表面上不傍依于任何党派来表白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客观上其著作却代表了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二是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他在“绪论”中特别指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这部编年史是用血与火来写成的。这是我国较早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

可以说,构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最初蓝本来源有两个,一个发源于名牌高等学府的讲义或著作,以近代化为主线,背后有美国的背景;一种发源于上海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政治课讲义,主要诉求是革命等,有较浓的苏俄背景^①。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这两种谱系,前者表面上以“近代化”为名来阐释中国近代史,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史”“中国革命史”“民族运动革命史”为主线来阐释中国近代史。有论者把这视为“现代化”和“革命”两种研究范式的前身^②。但深入考察这两种诉求,决不能仅仅看作是“两种研究范式的前身”。因为尽管都寻求对中国的政治组织、经济生产、社会行为、思想文化进行变革,但就这种变革诉求本身而言,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前者的改良性与后者的革命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影响也是截然不同的。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这两种表述,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政治派别的诉求。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蒋廷黻撰写《中国近代史大纲》,其理论根据实际是美国人马士

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其对西方的政治倾向性不言自明。

确切地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的近代史论述产生于当时的延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的光辉论述,长期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基础。范文澜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整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历程。随之,众多的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并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著作,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近现代史学体系初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特色的近代史学科更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资料得到系统整理出版。于是,以中国革命(含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演进为基本主线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论框架形成,我们熟悉的中国近现代史的革命范式也就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延续至今。中国特色近现代史的革命属性,在人类社会史中并非是孤立现象。近代民族国家,是对中世纪或者古代专制王权国家的反动,它们的诞生常常伴随革命。法国、美国等近代国家的诞生,都是以革命建国,因而它们同样重视其革命史的研究。如法国的历史研究之中,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是一个传统深厚,影响深远的领域,名著迭出,为世人瞩目。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学,因革命而兴,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学科,这个学科和革命有浓厚的血缘关系,具有“革命”的内核。中国革命是包括1840年以来的整体历史。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来看,经过中国人民持续不断的英勇斗争,我们已经产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果,足以写进人类历史。回顾这段历史,革命才是始终如一的主题。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了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性质、特征、途径、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新中国的成立提供了学理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学的上述基本论述,为一系列的冠以“中国近现

^①蔡乐苏等《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270-272页。

^②蔡乐苏等《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0页。

代”“现当代”名义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提供了研究的历史坐标。

当然,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有关革命史的论述,由于种种原因,也暴露出一些缺点。其宏大论述,可能有一些简单粗疏之处。随着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的兴盛和繁荣,有关研究揭示了以往研究未曾注意的层面,这种学术研究和探索是值得肯定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日益解放,哲学社会科学日趋繁荣,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迎来了大发展。研究的领域日益广阔、深入,除政治革命外,众多学者转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并取得累累成果。但无论如何,将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因政治革命的不断演进是时代的主题,政治革命的历史是近现代历史研究的中心内容,仍然没有变。

在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学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也就是说,时代赋予了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学新的使命和任务。总体而言,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仍然需要讲好中国革命的故事。因为几代中国先进分子对中国道路进行了艰难的探索,获得了宝贵经验,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对此进行研究、总结,可以发挥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和进步。

目前,史学界有学者开始了“新革命史”^①研究。“新革命史”研究的出现有研究者自身的意图,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深思的体现,也是对历史辩证法的运用,是用更宽的视野从更深的层面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让后人明白革命的胜利不是正确观念主张的轻松演绎,而是在特殊时代背景和残酷现实条件下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图强。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国革命内涵的更深认识,以及对革命的逻辑的理解更加

深刻。

归根到底,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研究要立足于中国人民的立场,发出中国人民的声音。中国近现代仁人志士所走的革命道路有其深刻的历史缘由,有其从自然到必然的过程,这一过程展示了中国人民对自己所选道路的自觉、自信,反映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但这里面仍然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研究责无旁贷的任务与使命。

二

探讨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的属性,有助于我们对其在研究方法层面上的理解。正是近现代中国的革命性变革,向中国近现代史学提出了问题。在新时代,中国近现代史学需要根据时代赋予的使命,吐故纳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②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学已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科学,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边界。因学人所在地域、研究机构和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形成了不同风格,并在各自方面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无论是在研究成果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当今时代,必须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笔者认为,在方法论的本然层面,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学研究者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具备通史眼光,打通学科边界,更要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未来中国特色近现代史研究的方法,首先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科学,是一个开放的

^①“新革命史”提法的产生,有一个较长的研究与反思过程。是指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力图丰富传统革命史观的思维模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运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国革命史加以重新审视和研究,以揭示中国革命运作形态中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

^②《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体系。在纷繁芜杂的世界面前,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加显示了其巨大的理论优势。中国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显示了中国史学的特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包含中国近现代史在内的历史学领域在过去获得了重大成就。尤其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学者们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立了一套论述体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史学资政育人作用。在思想交融、冲突日益纷繁复杂的当代,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仍然十分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披着学术的外衣,打着“理论创新”“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旗号,随意涂写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试图否定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否定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缔造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这些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虚无主义总是根据现实状况不断产生新的变化,但其背后的政治意图并没有改变。因此,近现代史学者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历史虚无主义加以反驳,并反对错误的历史价值观,维护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权。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①。

二是要努力打破边界,加强融合研究。历史具有延续性。打破历史时段边界,加强历史的深度融合研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这不仅是史学研究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新时代,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研究要打破学科、时段边界,至少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在历史学内部,中国近现代史

必须和前后的中国史以及世界史相贯通。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有追求贯通的传统,学者们往往将古代前后几个朝代连贯研究,取得众多重要成果。中国近现代史与古代史的打通同样十分重要,这不仅是历史发展延续性的要求,也是全面、深入研究的需要。由于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丰富等种种原因,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可能容易陷入自己的一块小天地,缺乏通观。中国近现代是在世界之中。无论在国内国外,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从创建开始,就有和世界史相打通的传统。清华大学史学系建立之初,有西洋史和中国史并重的传统。美国史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要求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生必须同时研究一个欧洲国家,以便培养研究者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世界的眼光。近年来更有全球史研究兴起,要求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亦必须借鉴这种研究方法,必能从中受益。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的贯通,并不会使得中国近现代史学丧失其主体性和特殊性。而事实正好相反,在和世界史的贯通中,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特色会得到凸显。

第二层含义,中国近代史学研究者必须充分学习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很多现象必须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方法来研究。这样才能深化研究,才能进一步展现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活力,此点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者的共识。

第三层含义,必须充分拥抱现代科技,利用现代科技提供的便利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我们正处于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技术革命给每个领域都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的研究将不可避免的遭遇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而我们现在的研究方法都较为“传统”,这样的方式有其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我们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补传统研究方法之不足。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如山,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①《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的优势,必能对研究大有裨益。

总之,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的研究决不能死守藩篱,固步自封,也不能划地为牢,只研究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必须防止史学界所谓的“碎片化”的现象,导致研究话题缺乏公共性。唯有如此,才能在未来的时代,更好地开创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发展的新局面。

三

讲好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故事的任务,最终需要由人来承担,因此有关研究者需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和研究能力。关于历史学者的专业素养,古今前贤早就有精彩论述。唐刘知己《史通》提出史才须有才、学、识“三长说”。清代章学诚在“三长说”基础上更提出了史德的要求。德、才、学、识四字简明而深刻。中国近现代史本身处于历史变革时期,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复杂的变革和革命,因此,自近代以来,这一时段的历史阐述一直受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必须保持中国特色,不受西方意识形态和别有用心势力的影响。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体系,推动近现代史学发展,更加需要一批具有德、才、学、识兼备的学者鼎力投入。

首先,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研究者要具备“史德”。

今天,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研究者当具有的“史德”,有两层含义。一是研究者要有治史者的历史和时代责任感。由于中国近现代史学有其特殊性,政治性强,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方法的原则基础上,借鉴中国古代的史官意识。史官意识最能体现中国传统的存亡继绝的史学精神,不曲学阿世。作为当代的治史学术活动,须有严谨的态度,负责任地记述、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既为后人保存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又为来者提供历史借鉴。我们借鉴继承中国历史上史官存亡继绝、不曲学阿世的史学精神,目的是忠于人民,坚持为人民写史的精神和立场。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人民

奋斗不息的历史,研究者必须有责任和担当。近年来,有些人仅凭一鳞半爪的碎片资料,就为某些反面人物唱赞歌,甚至以所谓的“曲线救国”论为抗日战争中的一些卖国贼歌功颂德,还有中国的“精日”分子屡屡制造事端,突破历史伦理底线,完全丧失基本的正确的历史价值观。还有些人完全捏造事实,对历史英雄如狼牙山五壮士、黄继光等历史英雄人物随意诽谤。对此,近现代史学者要秉持史德,不仅要在研究中还原历史事实,而且要敢于与这些从根本上扭曲、颠倒历史的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中,弘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培育健康的历史意识和审美文化意识,更好地维护历史真实和民族尊严。

二是要求研究者必须遵循现代学术规范,以维护中国近现代史学术的尊严与纯洁性。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研究是一项十分严肃认真的社科研究活动。面对中国近现代跌宕起伏的历史,我们有责任记述,为后人保存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向,因此,遵循学术规范是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应的现代学术规范。前辈学者在此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未来学者要遵循这些学术规则,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

其次,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研究需要“史才”。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才”,首先要能够独立发现重大问题,并进行深入专研,写出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①只有能洞悉近现代中国历史,发现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命题,才能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和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构建作出贡献。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才”,必须掌握大

^①《习近平同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再次会晤》,《人民日报》2015年6月25日。

量的文献史料,作出有理有据的科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有异于前代史的特点是文献数量极多,后学入门如不得门径,有望洋之叹,易落见木不见林之窠臼。而文献学,目录学,史料学等,是掌握近现代史学研究之学术规则门径。中国近现代史学有重视文献史料学的传统,不少学者躬身垂范,洞见极多,嘉惠后学。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才”,有一个历史编纂学层面的要求。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撰述之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史学以撰述之学为主,有一套史学撰述的制度和办法。无论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还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编年体,纪传体等,都与撰述之学紧密关联。传统正史都是每一朝代的史官依据官方文献纂辑成文,由后来人整理增删成书。中国史学界有责任也有义务“讲好”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给后代留下可靠的记载,或有资借鉴的历史。尽管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非复以往,研究者也并非史官,但不管怎样,借鉴撰述之学中诸多有益的成分,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服务,还是应该的。

近年来,无论是国家修清史,还是修民国史,都对史学界的编纂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未来国家层面的修史工程还将继续,从事中国近

现代史研究的学者,也要努力掌握撰述之法。当然,新时代的撰述之法,需要向传统的撰述之法学习,但也不能一味因循守旧,也要运用当代的叙事方法和技巧,并借鉴西方现代史学的某些撰述方法,从而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学的撰述之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①。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学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任重而道远。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中心任务是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创建中国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并从中阐释中国道路的必然性与价值。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非一日之功。但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领域的研究者,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开阔视野,活跃思想,不畏艰难,必能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发展的未来一定无限光明。

(责任编辑:王国宇)

^①《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